

昆仑文学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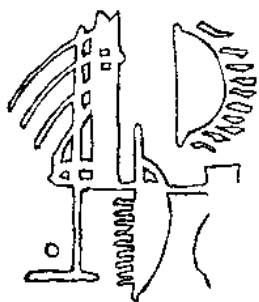
昆仑出版社



太阳方队

张波著





太阳方队

张 波 著

昆仑文学丛书·昆仑出版社

太 阳 方 队

张 波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昆仑出版社总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.5·插页1·字数158,000

1989年10月第1版·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500册

ISBN 7—80040—155—3/I·137

定价：2.90元



为他人写，也为自己写。

张波

TAL20/08 05

作者小传

张波，男。辽宁锦州人，十六岁参军，当过通信技师，而立之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毕业后在广州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。发表过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数十篇。有多篇作品获奖。

红舞鞋啊红舞鞋（代序）

几年前，我看过电影《红菱艳》，影片里有一双充满了魔力的红舞鞋，如果有人为它所迷住，一旦穿上它，就得不停地跳啊跳啊，不停地旋转啊旋转啊，直到死……

文学是双“红舞鞋”吗？

是的——我想。

有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几句玩笑话：前世作了恶，今生搞创作，写又写不出，跑又跑不脱。

哦，文学——可赞颂又可诅咒的事业。她是艳丽的魔鬼，是漂亮的女巫，是痛苦的欢乐，是绝望的希冀。她是丑恶的维纳斯，她是温驯的东北虎；她是绿草如茵的沼泽地，她是风平浪静的太平洋；她是伸手可摘的星星，她是水中微笑的月亮；她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曲线，她是一个有无数侧面的魔方；她缩小过去，她放大未来；她是披着面纱的美女，她是浑身赤裸的婴孩；她是智者的格言录，她是病态的白日梦；她是近在咫尺的地平线，她是远在天边的里程碑……

文学啊文学——一双可怕而又可爱的红舞鞋。

我穿上了这红舞鞋么？我不知道。

我只写过少得可怜的几篇作品（假如可以算作品的话），

便已“跳”得精疲力尽，“转”得晕晕乎乎了。

我还会“跳”下去么？我还会“转”下去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，离死，大约还有那么几年呢。

唉，这双该死的红舞鞋呀！在这个世界上，它的使命大概就是折磨人，折磨每一个爱它的人。折磨你，折磨他，也折磨我……

我真的爱上它了么？我不知道。

我的家庭很奇怪——爸爸是个大学生，却从不看文学作品，妈妈不是知识分子，却总是抱着小说不放。俗话说，女儿象爸爸，儿子象妈妈。于是，我也看起小说来了，看热闹，看得很带劲。为此，妈妈给了我一个小木箱，用来装属于我的书。有大书，也有小人书。那是一只黑色的小箱子，挂一把小小的锁，唯一的一把钥匙挂在我的腰上。即使大人们要看书，也得郑重其事地向我借。为此，我感到很充实——我有一笔锁住的财产。记得，那箱子盖的里边，还贴着一张刘少奇主席的像，也不知是为什么。“文革”一开始，自然也就撕掉了。

从小学三年级起，我偏爱语文。不为别的，是因为教语文的老师偏爱我。她叫赵秀英，是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。她领我去看戏，指着舞台四周的描花问我：“用什么成语描绘最合适？”我便搜肠刮肚地想，怯生生地回答：“龙飞凤舞。”她笑了，还奖励我——看完戏后买烤地瓜，一人一个，边吃边向回走。那烤地瓜极香甜，直到现在，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烤地瓜了。

赵老师对我太偏爱了，以至我的作文常常得一百分，而

且，有时还在学校里展览。有一次，她让我们造句，题目是“现在”。我随口答道：“我们现在正在造句。”于是，便得到她大大的表扬。放学后，她领我到她的宿舍，送给我一本当时很难买到的、已经破旧得没了封面的《汉语成语小辞典》。那辞典，我保存了许多年。

上中学时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教语文的老师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张老师，她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，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（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被剪掉），长得很漂亮。从她那里，我读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红卫兵诗。就在那时，我写了平生第一首诗：《下乡抒怀》；平生第一篇小说：《旅途上》。可惜，我不是神童，更不敢拿出去发表。这两个作品只有一名读者——我的一位表嫂。她的煽动性很强的“评论”虽然也没有发表，却已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而且，还奠定了我在家里的地位——从此便当起“师爷”的角色，给爸爸写检查，也写科技发明的经验材料。记得有一篇经验材料，开头便是两句豪情满怀的话：风暴险关敢闯道，冰山绝顶开红花……

今天，我真诚地感谢（或是真诚的怨恨？）他们——爸爸、妈妈、赵老师、小张老师、我的表嫂，是他们，给我介绍了这个可爱又可恨的恋人——红舞鞋。

我似乎爱上了红舞鞋。可是，它爱我吗？不知道。有一度，我们的关系曾破裂过，俗话说，是“吹了”。

我长大了。我当了通信兵。后来，当了通信技师，整天与电阻、电容、线路打交道。我想，从此要和红舞鞋绝缘了。于是，便把专业书以外的所有的书，一古脑送了人，专心致志地干起通信这行当来。

有一天，我收到一个包裹，是妈妈寄来的。打开一看，全是书，有《海岛女民兵》、《沸腾的群山》、《高玉宝》、《列宁回忆录》……这大概是“文革”中第一批重印的文艺作品。不久，我的那位表嫂又让表哥寄来了一套《红楼梦》，也是“文革”中第一次重印的。于是，红舞鞋又把我缠上了。我没完没了地看，自己看完了别人又借去看。若干年后，我还在老连队发现了写着我的名字的书，当然，已破烂得不成样子了。

为了参加军区举办的文艺会演，我和一个名叫范军昌的朋友合写了个小话剧。不曾料到，这个剧本竟获得了创作一等奖；更不曾料到，竟被军区推荐给《解放军文艺》发表了。

这是一九七七年的事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。

我狂喜！我骄傲！我自豪！我终于发表作品了！

我那时在武汉，专门跑到报刊零售部，看人家买那本杂志，一站就是老半天。至于我自己，则把那本杂志翻了无数遍……

这就是当时的我——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浅薄之极的我。

我太轻视红舞鞋了。于是，它便开始报复我了。

我试着写小说，写散文，写诗歌，写报告文学。写出一篇便寄出一篇，寄出一篇就被退回一篇，我至今还收藏着那些可怜的草稿。直到一九八〇年，我“编”的一篇小说寄给《解放军文艺》，小说组的刘宝玲同志专门利用出差机会到武汉看我，字斟句酌地告诉我怎样改，还列了一批优秀短篇小说的篇目让我学习。在他热情地帮助下，我的第一篇小说

发表了，题目叫《虎打武松》。这是一篇现在不敢再看一遍的东西，可以说是“惨不忍睹”。然而，它毕竟使我有了一个低得可怜的起点。

我艰难地写下去，痛苦地挣扎着。我写得少，发得更少。我没有一点自信，我才气不足，我功底太浅。我写下去，便越来越觉得不是搞文学的料。我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却仍是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。

我不敢再轻视红舞鞋了，可也不敢亲近它，它太可怕了！我恨它！

红舞鞋啊，你个骗子！

而今，我已过了而立之年。一种紧迫感时时在心头翻腾。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时代已一去不返。“而今识尽愁滋味”，却是“欲说还休”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幸运地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这里，有我们的系主任——著名作家徐怀中，有李存葆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同学，还有着那么多学识渊博的老师。我有了一个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机会。

人，简单到一撇一捺，复杂到万喜万忧。一个人应有知人之明，知世之明，更应有自知之明。而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又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啊。

我不该自傲（这太浅薄），也不该自卑（这太软弱），我活着，本身就是“合理的”，总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条件。我努力寻找自己的优点（这有点大言不惭），我发现自己还算聪明，学东西很快，记忆力也还好，模仿力也挺强……可惜，这些都只是小聪明。

我明白了我先前的失败——我是一直凭这点小聪明在文学上装模作样的。

仅仅凭小聪明是不配穿红舞鞋的。

我想起了谈恋爱时，我对象（现在的妻子）的姐姐曾尖刻地说我，是连队比出来的小聪明。我不服！气得要死。差点和她的妹妹吹灯。

今天，我承认了这一点。真心真意地，承认。

怎么办？和红舞鞋招招手，说一声“拜拜”么？不行，上贼船容易，下贼船难。红舞鞋一旦穿上，你不是“跳”到死，“转”到死，就是把你给拖死，我毕竟是爱它的呀！

那天，爸爸来学校看我。告诉我，我家旁边新来了一户邻居，女主人是我小学的同学，姓苏。一下子，我想起了她，因为，她帮我打过架。那时，我是一个软弱的孩子，从不敢同人打架，如果碰上了，便只有挨打的份儿。有一回，班里一个很会打架的男同学追着打我，我拼命地逃。在家门口附近，正碰上这位女同学。她见状，二话不说，上去给了那小子两拳。也怪，那小子竟傻了似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半晌，说了句“你等着”，便呜呜地哭着跑了。我很感激这位女同学，她却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窝囊废！”

这大约是我的劣根性，竟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在这可爱又可恨的红舞鞋面前，我不能再当“窝囊废”了！

红舞鞋是个极爱挑剔的情人——

浅薄的人不能穿它；

软弱的人不能穿它；

无知的人不能穿它；

没有毅力的人不能穿它；

不爱生活的人不能穿它；
思想贫乏的人也不能穿它……

一句话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就不配穿上它！它曾欺骗过许多人，但它从未欺骗过真正的人！

它让你不停地跳跃，在跳跃中使你升华。它让你不停地旋转，在旋转中得到充实。它使你品尝到精疲力尽后的幸福，它使你体会到晕晕乎乎后的欢愉。穿上它，便注定你要痛苦一生，然而这痛苦越深，幸福便越大。它要求爱它的人是一个勇敢的汉子，大胆地，不顾一切地将它穿在脚上；它更要求爱它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强者，即使跌倒一百次，也能在第一百零一次的跳跃和旋转时完成得很出色。假如，你跳到了生命完结的那一天，你也要悲壮地、从容地倒下，要倒得很漂亮！

遗憾的是，我还不是这样一个强者，还不是一个真正配穿红舞鞋的人。

不过，我将努力！

红舞鞋啊红舞鞋，你等着……

目 次

红舞鞋啊红舞鞋(代序).....	(1)
共 鸣.....	(1)
太阳方队.....	(18)
小桥上有块木牌牌.....	(27)
死去的和活着的.....	(46)
蓝天, 那群鸽子.....	(71)
碎 片.....	(83)
绞.....	(104)
猎.....	(113)
军歌变调又名蒙昧年代.....	(122)
乌 鳢.....	(122)
懒 云.....	(132)
画 谜.....	(139)
活 过.....	(150)
圣 土.....	(160)
虎皮鹦哥.....	(176)

一品红.....	(186)
富兰卡.....	(198)
金色黄昏.....	(208)
零公里.....	(218)

共 鸣

晚饭又是馒头、咸菜、苞谷粳儿，讨厌！通信八连电话站的女兵们随便应付了一下，便陆续溜回了宿舍，纷纷拿出自己的食品贮藏，糖啊果的塞满了一嘴，笑声，便在夏天傍晚闷热的空气中荡漾开了。

晚饭前，连长刚在队前向全连介绍了从通校毕业的新任电话站长高岩，女兵队列里就发出了“哧哧”的笑声。高岩，漆眉亮眼，鼻正口方，身材适中，军服笔挺，显得很精干……哪都顺眼，就是肤色太黑了点。不过，男子汉嘛，无可非议。可是，连长刚宣布“解散”，刘婷婷就没头没脑地说了句：

“坦桑尼亚！”惹得女兵们又是一阵嘻嘻哈哈的笑。尽管连长颇不满意地看了她们几眼，却也没说出什么。本来嘛，有人总结说女兵走的是“三部曲”：刚当兵是嘻嘻哈哈，有了对象就拖拖拉拉，结了婚就该婆婆妈妈。眼下，电话站的女兵们正是“嘻嘻哈哈”的年龄，能不让她们笑么？

通信八连百十号人，以“大丈夫”居多数。对于这些从城市入伍的“女同胞”，男兵们习惯地沿用着部队里对女兵的

传统称呼——“土八路”。尽管这个称呼中究竟包含多少贬意还值得认真分析，这仍使女兵们着实恼火。据考证，“土八路”一词的出处是电影《地雷战》，于是，女兵们反唇相讥：我们是“土八路”，难道你们是“洋鬼子”么？一句话，噎得男兵们直瞪眼，只好叹口气：唉，“土八路”，厉害呀！

其实，“八路”是没什么贬意的，女兵们真正恼火的是那个“土”字。说这些女兵“土”，实在是不实事求是。在部队严格的纪律约束范围内，女兵们在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：战士不准烫发吗？用发卷、电热梳卷卷刘海，辫梢总可以吧？不准穿高跟鞋吗？买双拖鞋跟高一点说得过去吧？不准戴首饰吗？胸前别个花篮、小提琴、孔雀之类的纪念章不犯纪律吧？当然，从美学观点出发，女兵们也多少干了些诸如把裤腿改窄一点之类的“不法行为”，这使得连队干部很看不惯。指导员曾召集女兵们讲了两次，但是，这些女兵说轻了她跟你笑，说重了她向你哭，几哭几笑过去，裤腿终究没改过来，头发也照样卷着，真没办法。

“哎，怎么上级给咱们弄来这么个站长？”说话的正是吃饭前说“坦桑尼亚”的刘婷婷。她是电话站里的“明星”人物，人长得漂亮，细眉俊眼的，一笑俩酒窝。身材象她的名字——亭亭（婷婷）玉立。猛一看，似乎与其他女兵没什么不同，仔细看看就会发现，她虽然也是梳小辫，可小辫的样式是不断花样翻新的，今天是辫梢翘天，明天又是辫梢扫肩，每次洗了头，还松松的挽个“马尾巴”。胸前挂的纪念章是永远区别于其他女兵的。至于裤腿呢，也当然比其他女兵改得更窄一点。女兵们公认她“集中了中国姑娘的一切优点”，无形中，她成了女兵们暗暗模仿的“模特儿”。难怪外号叫“喜

鹊”的王兰兰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，竟然说：“咱们婷婷要不是穿这身‘大兵’服，哼，陈冲算老几？李秀明算老几？”

“就是。娘子军连来个‘党代表’，黑老鸹似的，没劲。”

“喜鹊”随声附和着，伸手从刘婷婷手里夺过一块椰子糖，老实不客气地往嘴里一丢。她们之所以称高岩为“党代表”是因为他一来就被补选为党支部的青年委员。

刘婷婷忽然来了情绪：“看我给你们表演一段。”说着，用筷子敲着碗，有板有眼地念叨起来：“高站长黑，可真黑，赛过张飞，胜过李逵，气死唐朝的薛仁贵，东山烧过炭，西山挖过煤，还当过煤店的二掌柜……”没等说完，女兵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了。王兰兰先是让椰子糖卡住了嗓子，“咯”地一下把糖吐出来，才捂着肚子直叫：“哎哟，我的妈吔。”刘婷婷见状，也勾着小张的脖子笑得喘不过气来，指着王兰兰：

“看你……样儿……”突然，刘婷婷发现王兰兰的脸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样儿，她顺着王兰兰的目光望去——天！门口站着“党代表”——高岩。

女兵们一阵忙乱，收拾糖果盒，抻抻衣角，王兰兰竟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，一脚把刚才吐出的糖块踢到了床底下……这时，高岩微笑着开口了：“怎么？吃糖不算我一个？还要收起来？好，我自己拿了。”

女兵们一怔。

“给。”刘婷婷把一块糖递过去。

“哦，上海‘大白兔’，好糖，得奖产品。”高岩剥开糖就吃，吃得津津有味，“你们都爱吃糖？”

“你呢？”王兰兰躲在刘婷婷身后反问道。

“好吃的东西我都爱吃。”